

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“潮动中原”系列报道之十三

一个内陆特区和一个食品城的崛起

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/图

核心提示

资源缺乏的漯河市,依靠交通优势、内陆特区的金字招牌和农业资源,努力发展食品工业,经过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拼搏,打造出一系列中国食品名牌,全国每10支火腿肠有5支出自漯河。全市有大小食品企业7056家,直接从事食品工业人员11.2万人,170万农民依靠养殖业致富,食品工业收入占市财政收入的70%多,占全市GDP的60%多,成为唯一的“中国食品城”。

因交通优势设为省级“特区”

沙河和澧河这两条河流在漯河交汇,清朝时,漯河码头就形成了牲畜交易市场,四面八方的牲畜都靠水运到这里卖。现在漯河还有一条路叫牛街,虽然听起来别扭,但它是历史的见证,走在这条路上,听着当地人的讲述,前辈们站在成群结队的牲畜旁讨价还价的情景会油然而生浮现眼前。

就是因为这个水路码头,旧社会漯河人就做起了牛经纪、猪经纪、羊经纪,从买卖中谋取差价。同时,为了满足南北往来的口味,小饭馆把牛、羊、猪肉也做出了美味佳肴。

后来,京广铁路从漯河经过,漯河的交通优势更加凸显。得益于交通优势,1947年陈赓兵团解放漯河后不久就设立漯河为县级市。

随着环境的变化,河水越来越少;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,私人经商销声匿迹。改革开放前,漯河人失去了河流赐予他们的恩惠,昔日繁忙的牲畜交易情景成了美好的回忆,成为典型的农业市,农民只能靠土地生活,温饱问题难以解决。改革开放后,农民获得了土地,虽然温饱问题得以解决,但在当时,“特区”这块金字招牌十

分吸引人,很多投资者特别青睐。于是乎,一些国内外投资者瞄上了漯河“内陆特区”,带着资金走进漯河投资兴业。

濒临倒闭企业 打造的中国品牌

上世纪80年代,创建于1958年的漯河肉联厂因“水性”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浪潮,到1984年全部家当只有一座3000吨的冷库、一座日加工500头生猪的车间和一座炼油坊,固定资产只有468万元。创建26年间,不但没有给国家上缴一分钱,还累计亏损了580万元,站在倒闭的悬崖边。

1984年,国家取消了生猪统购统销的政策,迫使肉联厂自找活路。

作为承包制改革的试点单位,800多职工把票投给了万隆这个转业军人。见过世面的万隆抓住“在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之后,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一些原材料”的政策,承包当年扭亏为盈,填平了亏损窟窿,还盈利8000元,摘掉了亏损帽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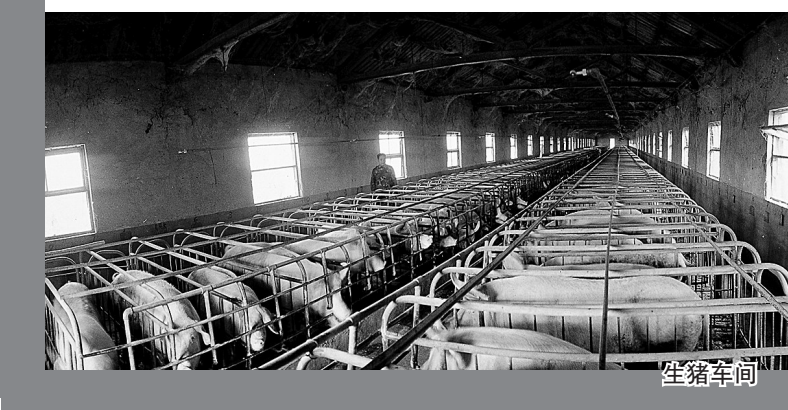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,他们投资对分割肉车间和配套设施进行技术改造,获得出口资格,接下了一个50万吨出口分割肉订单。就是这个不大的订单,依靠质量,让漯河肉联厂一鸣惊人,外贸订单纷至沓来,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市场,从此,肉联厂获得了新生。

1994年,在众多合资对象中,肉联厂选择了香港十大财团之一的华懋集团,引入资金1.27亿元,成立了华懋双汇实业有限公司,把火腿肠生产线有45条扩展到69条,建立了亚洲最大的肉制品大楼,生产能力增长了104%。1998年“双汇发展”股票上市,更让双汇如虎添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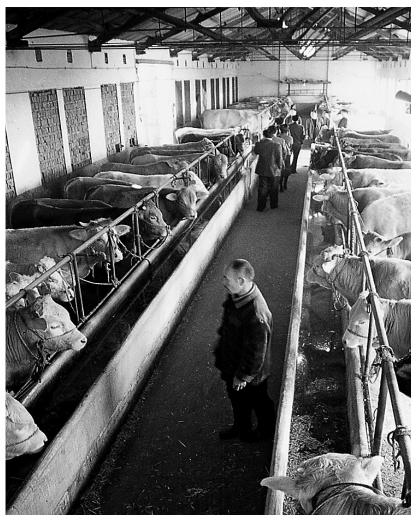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来,双汇先后与美、日、德等6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合资合作,建成30多家公司。2006年迎来了世界500强高盛加盟。



生产车间



生猪车间



出骨的猪骨

15万吨,方便食品23万吨,大豆分离蛋白2.5万吨,花生制品10万吨,饲料60万吨。

截至去年,漯河市各类食品加工企业发展到7056家(规模以上有191家),占全市工业企业的50%,从业人员11.2万人,占全市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34.9%,实现工业增加值134.5亿元。经济增速在6年前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30个城市之一。

食品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

食品企业龙头不仅带动食品业的强劲发展,还带动了上下游产业——包装、印刷、养殖、运输等产业的迅猛发展。

包装材料龙头企业有双汇集团化工包装公司、南街村集团彬海胶印公司、华强公司,他们生产PVC肠衣膜、多层共挤热收缩筒状膜、彩色软塑料印刷制品、胶印制品等供不应求。仅双汇的肠衣膜生产量,年产量就有1.5万多吨,年产值5亿元。双汇集团所有包装材料业年产值达16.5亿元。

食品机械也应而生,企鹅集团生产的面粉机60多个品种,不仅销往全国各地,还出口

埃及、俄罗斯、蒙古、越南,年产面粉成套设备1000套。

最主要的是带动了畜牧业、饲料业、蔬菜种植业的发展。双汇每年加工生猪1500万头、活牛50万头。于是,漯河市大力扶持农民从事养殖业,更扶持规模养殖户。市政府成立了主要领导为成员的专门机构为畜牧业出谋划策,各县领导签订目标责任书,市直20个部门都有畜牧业倾斜政策。

一大批农民靠养殖业致富,全市254万人口,有170万人从事养殖业。过去穷得叮当响的漯河农民,如今人均年纯收入4567元,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打造名副其实的国人厨房

过去漯河人为之骄傲、津津乐道的是: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8000年前的甲骨文契刻符号和用猛禽骨管制作的七音骨笛,中国第一部汉语大字典《说文解字》的作者许慎是漯河人……如今漯河人津津乐道的是,他们是全国首家“中国食品名城”,是国人厨房中的厨房。

漯河市市长祁金立说:“未来漯河市食品工业发展的重点是:在肉食品加工工业方面,加快特色养殖基地的建设,提升精深加工肉制品比重,积极发展牛、羊、禽类肉制品,加大新产品开发和综合利用,发展调味品业,加快肉食品加工工业项目建设;在粮食加工及制造业方面,加快优质粮种植基地建设,进一步提高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、油精深加工,积极发展饲料加工业,加快粮食加工及制造业项目建设;在饮料制造业方面,着重发展功能型饮料、啤酒、肉制品蛋白饮料,加快饮料制造业项目建设。”

漯河人说:“既然是厨房,就要干干净净。不干净的厨房,做出来的饭菜愿意吃?”所以,他们大力投资绿化,使绿化覆盖率、绿地率、人均绿地面积分别达到40.3%、32.6%和12.6平方米,被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、全国绿化模范城市,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。进入市区,好像置身于江南城市,空气湿润清新,地面干干净净。

漯河市已成功举办了5届中原食品节,他们计划将今年的食品节办成由商务部主办的中国食品节。目前,全市上上下下正在紧锣密鼓筹备8月份举办的食品节,力图在食品节上摘取丰硕的成果。

救楼市还是救寒士是个问题

最近,房地产市场“救市论”甚嚣尘上。据《华夏时报》7月12日报道,中央决策层近期正组织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一次全面调研,调研的结果将作为“是否救市”的最终依据。

房价连续上涨了近十年,最近两三年出现几近失控的疯涨,使得楼市的泡沫越吹越大,对国家宏观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,同时,由于楼市投机炒作盛行,楼价虚高且节节攀升,大大超出一般居民收入增长和承受能力,制造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特殊群体——“房奴”。为此,从中央到地方,从高官大员到普通百姓,都希望房地产市场尽快回归理性、健康发展轨道上来。

然而,就在中央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发生效应,深圳、北京、武汉等大城市房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回调,商品房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之时,市场上开始出现谁谁“先死”的怪论,房产大佬们不断放话呼吁政府出台“救市”政策。

房价连续上涨,涨到100%的利润,现在才刚刚跌一下,就开始喊“救市”了。难道房市不受市场经济规律约束只能涨不能跌?

要求“救市”可以,但是,请拿出“救市”的理由来!是房价跌到成本以下了吗?据近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,在前不久,武汉一家房地产业公司不仅公开宣称,房地产存在暴利,而且主动把自家楼盘的销售价下调了30%,但即使是这样,他们还能得到10%到15%的利润;是月供中断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了吗?据日前《深圳商报》报道,近期不少外地媒体纷纷热炒“深圳千亿房贷断供”的消息。近日,记者走访多家商业银行,面对“断供千亿元”说法,不少银行业内人士直呼“荒唐!”

既然以上两点都不成立,那么为什么说房地产市场已经到了“救市”的地步了呢?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并没有过头,还处在“健康、稳定”可控的范围内,为什么要急着“救市”?全国中小城市的调整还未开始,有些地方房价不仅没跌反而逆势上涨,这些地方尚在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,为什么要急着“救市”?

我们看到,鼓噪“救市”最凶的是那些房地产商及其利益代言人,是那些手中被套牢十几套、几十套住房的炒房客。他们要么绑架银行,扇阴风点鬼火,发出“要死一起死”(甚至威胁说银行先死)的怪调;要么以“断供”造成银行呆坏账要挟政府部门就范。显而易见,这些利益集团所救的不是中国经济,更不是那些买不起房的老百姓,他们所谓的救市目的是为了让他们重新回到原来的暴利水平,是让最需要住房的广大人民群众重新回到买不起房的绝望中去。

既然“保持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、持续、稳定发展”,是为了“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水平和居住条件”,那么,在目前房价水平依然居高不下,或者根本没有调整到位,很多工薪收入阶层依然望房兴叹之时,我倒要问问狂喊“救市”的人,你们究竟要救谁?是“救”那些富得流油的房产商、炒房客?还是“救”那些上无片瓦的天下寒士?这不仅关系到经济观点问题,而且关系到立场、良知和感情问题。如军

干部满意度民调要确保听到真话

13日从中央组织部获悉,经中央批准,中组部已委托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起每年在全国31个省市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、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,以及对组织工作的具体意见、建议。

“干部群众对组织工作、组工干部形象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、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工作的满意度,以及对组织工作的具体意见、建议。”这是件大好事,这就要求民意调查要确保听到真话。

组工干部,一向是把握干部提拔任用的生杀大权的,调查谁才能有代表性?“调查将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,在中央机关、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各层次的干部和群众中抽取近8万人开展调查。”这就得采取匿

名制,才能让被调查者敢说真话,表达真意愿;要让老百姓成为主要的被调查对象,只有他们知道组工干部选拔任用的是不是好官。

如何确保是真的民意表达?这就涉及个对统计过程和统计结果的监督问题。一切在公开透明状态下,在大众的监督之下,才能让统计的过程和结果令人信服。半遮半掩,是很难有客观、公正的统计结果。没有真实的民意表达,就会让统计失去意义和价值,最终会流于形式。

对民意调查的结果,要认真分析,对有问题组工干部绝不能姑息迁就,听之任之,不能调查了事。在民意调查之后,要有配套的行之有效的制度,这个制度要对组工干

部起到震慑作用,对干部任用制度起到指导性作用。要慎用或不用民意不满意的组工干部;要破格或积极培养满意度高的组工干部。要把民意调查作为组工干部任用提拔的重要依据。同时,要顺藤摸瓜,把那些深水摸鱼、滥竽充数的干部一并调查清楚,该撤的撤,该降的降。

要用这样的调查,给组工干部作风和组织工作存在的问题,来次彻底地纠错,坚决杜绝干部任用上的不正之风,打击卖官鬻官的歪风。

调查民意,是为了用好组工干部;只有用好组工干部,才能选拔和任用“好干部”,这才是民意最关心的问题。只有用好干部,用“好干部”,才是对民意调查信息的最好反馈。严朝霞

国企领导上缴红包值得宣扬吗



7月13日的《南方日报》报道,去年以来,广东省共出台国资监管制度25项,推进了国资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作,有308名国企领导人员主动上缴“红包”151.22万元。

很明显,这是被当成了一种成绩进行宣扬的,但在网络上,有很多网民对此提出了质疑,认为这些上缴的红包只是小儿科,根本不值一提。网民的质疑可能有点偏激,毕竟,谁也不知道国企领导一年收受

动上缴红包者可以免受处罚”之类的激励措施。每次专项整治,也的确有很多医生上缴红包,但数额往往与公众想象中的相去甚远。而在每次类似的专项整治之后,医疗红包现象反而愈演愈烈。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,医生完全可以在患者身上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拿回上缴的红包。

这样的一个怪圈表明,其实我们的政策已经陷入了道德自律的迷局中,但每个人都清楚,一项建立在道德自律基础上的公共政策,只能是沙滩上的城堡,或许有瞬间辉煌,但潮水一来,马上就将无影无踪。

无论是医生还是国企领导,他们收受红包的基础是权力,而对权力的监督从来都不能靠权力拥有者的道德自觉,而应该是严密甚至苛刻的制度。但“上缴红包”之类不被宣扬的业绩,却令决策者在不知不觉中更依赖于道德自律瞬间的辉煌,而不愿为严密制度设计付出更艰辛的努力,这实在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。

文冬晖 漫画 许剑英

张孟苏经历所带来的启示

因为不经意的助人行为,张孟苏获得了一次意外的面试机会,最终被预录为新加坡政府理工学院学生,并获得20万元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。张孟苏是武汉东湖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,她的高考成绩在国内只能上个独立学院,如今,人生际遇却发生了传奇般的变化。

我们很难想象,帮老师拆雨棚的助人行为,能与大学招生相联系。这个举动太不起眼,按我们惯常的理解,即便有某大学老师“独具慧眼”,从这小小的细节中看到了她的内心品质,也不至于会拿招生活面试事。因为,在固定的招生程序中,人对人的发现是不起作用的,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些“书面作业”,例如考试分数、填报志愿、招生政策的解释等等。

不可否认,有了固定的程序,招生的确能首先保证公平和效率。一个老师不足以发现一个优秀的学生,但一个规范且统一操作的招生流程中,只要分数达标了,就可以被录取,日常的行为表现则是微不足道的。遗憾的是,这样的公平、效率,只不过是建立在单一分数的简化评价体系上。张孟苏的“优秀”,偏偏不在分数上。在这样的招生程序中,她难以获得如此面试机会,不得不面对独立学院的选择。

当然,国内的大学也会为一些偏才、怪才打开大门。我们姑且将这类人才称为“特殊人才”,是属于分数决定权暂时失效、有特殊通道予以护航的一类。摆在我们眼前的例子是,“少年天才作家”蒋方舟获得了进入清华的机会。类似的例子还有更多,不独智力上的“特殊人才”,也包括体育上的等等。可是,对于“特殊人才”的“特事特办”,往往又是灵光一现,是在新的标准缺失的情况下完成“不拘一格”的尝试,而非“特殊通道”有多么常态的设置。况且,“特殊人才”往往和社会名声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,张孟苏大概也不能算在此列。

就国内大学而言,有望吸收张孟苏这类非分数意义上的优秀学生,可靠的渠道似乎不多。即便有了自主招生,依然要以高考成绩为基础,自主招生实为“分数打折”,并非破除分数的一元决定权。以此审视张孟苏的传奇经历,她的成功预录,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新加坡大学招生的标准多元化、渠道多样化。而在偶然的情境下,张孟苏得到了面试机会,获得了新的机会,在我们眼中还带着一些传奇色彩。

张孟苏的成功,得归功于优秀的面试,归功于日常生活、学习中积累的点滴成绩。当面临新的评价体系,她分数之外的优秀得以呈现,得以被承认。

张孟苏所获得的机会,实则为一种新的评价体系。这种评价体系能分散分数的权威,能惠及学生德智体的各个方面,老师当然能够去充当伯乐的角色,不放过一个学生的偶然表现。

对此,我们得到的启发是:给学生多一点机会总是好事,这种机会的给予有多大程度的自主,高考分数的权威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打消。肖畅